

2020年3月 总第101期

新年特刊

国外研究生教育动态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主办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育教学与人才成长研究中心承办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www.csadge.edu.cn

评论	1
未来十年亚洲高等教育能否实现飞跃发展?	1
英国应如何在高等教育的新地缘政治中自我定位?	2
澳大利亚大学未来发展的坎坷之路	3
国际新闻	4
全球: 西北大学主办 2020 年 U7+全球峰会	4
美国: 国会成立新机构以应对外国对美国研究的影响	4
欧洲: 英国与欧盟承诺在脱欧后仍保持大学间的合作	4
瑞典: 首个有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研究生学位项目大受欢迎	5
爱尔兰: 爱尔兰高校获得六项欧洲研究资助	5
非洲: 女性在 STEM 领域的领导力——政策需求	6
朝鲜: 国际教育日渐开放	6
专题一: 专业博士培养(综述/新闻/学术前沿/书籍推荐)	7
《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综述》	7
美国: 普渡大学技术学院开设首个远程博士学位项目	8
加拿大: 卡尔加里大学设立“设计博士”学位	8
《专业博士学位课程影响与成效的测量》	8
《专业博士学位的质量保证: 从导师的角度挑战传统规范》	9
《学生对香港教育博士及教育哲学博士的认识》	10
《专业博士的实践研究方法》	10
专题二: 校企合作(报告/评论/新闻/学术前沿/书籍推荐)	11
《校企合作: 新的证据和政策选择》	11
加拿大的校企合作项目设计存在问题吗?	12
全球: 校企合作是抗击冠状病毒的关键所在	13
《重构社会科学博士教育中的组织合作》	13
《新兴国家工科毕业生是否准备好从事研发工作?以教学为中心的产学协作战略》	14
《资深专家如何基于高等教育的工作实践发展创业技能: 文献综述》	14
《战略性校企合作伙伴关系: 创新型企业的成功要素》	15
专题三: 高校如何应对环境危机(政策文件/评论/新闻/学术前沿/书籍推荐)	15
《哈佛大学 2015-2020 财政年度可持续发展计划》	15
大学能为应对气候变化做更多的工作吗?	16
英国: 罗素集团联手应对气候危机	16
英国: 约克郡科学家将领导气候变化数据新研究	17
《I3E 模型: 将可持续发展教育纳入高等教育机构》	17
《国际研究概念框架下的高校气候变化教育》	18
《大学在应对和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的举措》	18
读者意见征集	19
版权声明	19

评论

未来十年亚洲高等教育能否实现飞跃发展?

2019年,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份报告中提到: “19世纪的世界以欧洲为中心, 20世纪的世界以美国为中心, 如今世界进入亚洲化时代, 而且其发展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这句话预测了本世纪20年代高等教育的五个发展方向, 也提醒我们要对“亚洲时代”有所关注。

1. 亚洲将成为世界主要的教育中心。虽然部分群体可能认为中国的审查制度、印度近来的校园暴力事件及香港近期发生的抗议活动会在短期内削弱亚洲作为全球教育目的地的吸引力, 但是任何有着5所世界前100强高校的地区(如香港), 都具备吸引学生的强大基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留学生教育领域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在高校质量提升方面的长期投资也初见成效。印度发展成为国际教育中心的潜力非常明显, 但如果不采取十分积极的高等教育体系改革措施, 中国将取而代之成为亚洲最具吸引力的教育中心。

2. 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为非洲学生提供了低成本选择。成千上万的发展中国家学生借由“一带一路”计划来到中国求学。15年来, 来华留学的非洲留学生人数从2003年的1,793人增长到2018年的81,562人, 增长了40多倍, 推动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非洲留学目的国。印度也一直在努力适应非洲青年学生人数的快速增长, 2019-2020学年印度提供了超过900个非洲奖学金名额, 2019年举行的“印非高等教育和技能发展峰会”也是人们关注非洲国家与印度之间联系的一个典型事件。

3. 传统英语国家不得不考虑在亚洲开展业务。东南亚国家联盟或东盟地区将是传统英语市场的下一个主要增长中心。《全球高等教育的形态: 了解东盟地区》一文指出, 东盟地区10个国家中有9个在跨境开放方面的总体得分很高。这些得分主要衡量了东盟国家支持学生和学者入境和出境流动的国家级战略、学术项目的开放性与合作研究等方面。澳大利亚在该区域表现十分活跃, 提出了许多倡议来支持青年流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则远没有那么积极, 如果再不采取行动, 恐怕会错失良机。

4. 就业能力将成为高等教育差异化的最重要因素。澳大利亚已经将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作为大学获得资助的关键因素, 英国的“卓越教学框架”和新保守党政府可能也会效仿。毕业后能否找到工作将是留学生教育投资的核心所在, 相应地, 国内和国际就业能力数据将成为衡量大学表现的关键绩效指标, 打破现有的以声誉、排名、研究和学生体验为核心的指标体系。同时, 任何一所将国际学生的就业能力作为工作重点的大学都将脱颖而出。

5. 亚洲或成为西方国家的就业中心。亚洲经济的增长为接受过国际教育的毕业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随着毕业生就业市场向东方靠拢, 不断扩大的“技能缺口”有望得到填补。西方大学为使学生

拥有最大成功机会, 也需要增加与亚洲地区公司或部门的对话。21世纪20年代, 全球将见证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 亚洲的高等教育也将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发展。

(翻译 / 陈庆 校对 / 赵丽文)

[来源: 英国《大学世界新闻》, 2020年01月18日](#)

英国应如何在高等教育的新地缘政治中自我定位?

英国脱欧意味着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开始, 这既令人担忧, 也让人兴奋。在新秩序尚未明确之时, 英国各高等教育机构均有机会获取巨大的先发优势, 自主建立新的合作模式, 不过, 自主模式能否持续并无保证, 这也给各机构负责人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对于英国的高等教育而言, 欧洲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有关数据显示, 英国与21个国家的研究人员具有较高频率的合作, 其中17个是欧洲国家, 其他则是英语国家(澳大利亚、南非、新西兰)和智利。值得注意的是, 加拿大和美国不在此列。未来, 英国将尽可能地与欧洲国家保持最紧密的联系, 但这种联系已不可同日而语, 双方都缺少足够的激励举措。与此同时, 英国的高等教育仍然需要发展, 许多大学和一些国家政府也希望同英国的大学合作。因此, 未来英国的高等教育将有两个主要特征:

一是全球挑战。自《斯特恩报告》(Stern review)对气候变化经济学进行评估以来, 英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一直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美国的能源和塑料行业过于强势, 这为英国提供了一个机会, 既可以填补地缘政治的真空, 同时可以保持欧洲的团结。这一计划推动了英国科学的发展。高等教育领域和政府部门都重视科学的价值, 对英国的高等教育领域来说, 这不仅可以提升其国际地位, 也可以提高其在国内的地位。

二是加深与东亚的联系。东亚是一个比欧洲更大、更有活力的经济和文化区域, 包括韩国、日本以及更重要的, 中国。英国是英语国家中与中国联系较少的国家, 高等教育领域也不例外。英中研究合作强度远低于美中和澳中。除了宁波诺丁汉大学和西交利物浦大学, 中英两国少有共同的利益或共识。不过, 英国突然提出加强中英两国往来的战略需求可能成为在最错误的时间提出的正确想法。美中对抗可能会为英国大学创造机会, 但是英国大学需要明白, 中国文化同英国文化一样深刻而复杂。中国大学的运作方式在某些方面与西方大学存在差异, 英国大学需要加深对中国的了解。

高等教育的定位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政府的行动。如果英国主导自己与中国的关系, 这将给高等教育部门提供活动空间。英国拥有一个高度集权的政体和一个受监管的、独立于行政部门的高等教育部门, 但正如英国脱欧时所显示的, 规则是由政府制定的。英国脱欧后, 国家战略的空白将持续存在, 但不会长期存在。这为高等教育提供了一制定规则、采取行动、定义联盟框架、建立自身全球地位的机会, 这将有助于重塑民族身份。英国高等教育部门不能再袖手旁观, 只有主动出击, 才能把握时机。

(翻译 / 李欢 校对 / 王莹)

[来源: 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 2020年01月30日](#)

澳大利亚大学未来发展的坎坷之路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成功源自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的高等教育改革, 例如合并机构、建立全国统一的高等教育制度、增加受公费资助的学习机会以及建设基于学科和学习阶段的新资助模式等。在随后的改革浪潮中, 澳大利亚政府进一步推进了高等教育市场的自由化, 强调机构间的竞争, 并放松了对高等教育行业的管制。

从 2000 年到 2017 年, 澳大利亚的国际学生学费增长速度是政府对大学投入资金的增长速度的五倍, 这导致大学主要依靠国际学生的收入来补充政府投资的不足。也就是说, 如果国际学生人数(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学生人数)下滑, 澳大利亚的大学将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2018 年, 澳大利亚的国际学生中有 33% 来自中国大陆, 而 2000 年这一数字仅为 4.6%。澳大利亚作为全球教育领导者的关键特征在于其在过去的 20 年建立了强大的质量保证体系。与其他国家相比, 澳大利亚高校的独特之处在于: 高校数量相对较少, 大学在校生人数相对较多, 所有大学几乎都是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且均提供博士课程等。这些特点既是优势, 也是劣势, 例如: 优势学科的特色无法进一步凸显, 差异化的缺乏很可能会造成生源流失, 因此大学需要审视其价值主张, 找到自身与众不同的特点。

在澳大利亚, 终身学习者(以及寻求第二或更高学位的学习者)被认为最有可能推动来自国内的教育需求, 而国内学生作为澳大利亚最主要的学生群体, 正在越来越多地转向在线或其他多种学习模式, 国内研究生也在显著地转向校外学习模式。到 2030 年, 据估计, 只有大约 40% 的国内研究生会在校园学习。学习模式的变化意味着大学决策者需重新思考如何支持文化背景和种族来源越来越多样化的学生和教职工。

近年来, 由于英美两国的动荡局势, 澳大利亚在国际学生招收方面获益。但是, 澳大利亚在吸引顶级学生方面仍落后于这两个国家。同时, 随着中国教育质量的不断提升, 未来很可能会看到中国学生对海外学习兴趣的减弱。澳大利亚的大学需要有一套完善的风险管理策略, 招生需要面向更广泛的群体, 更应偏向于中等收入经济体以及与澳大利亚建立了战略贸易伙伴关系、拥有统一学位认证体系的国家。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 澳大利亚的大学可能会面临经济、政策、发展方向等诸多方面的挑战。毫无疑问, 澳大利亚大学的前路是坎坷的, 政府、社会、市场和大学领导者需要全面考虑人口特征和地缘政治的转变可能带来的影响, 并采取及时、适度的应对措施。

(翻译 / 林婕 校对 / 黄宗坤)

[来源: 英国《大学世界新闻》, 2019年11月30日](#)

国际新闻

全球：西北大学主办 2020 年 U7+全球峰会

2020年6月, 第二届 U7+峰会(Global U7+ Summit)将在美国西北大学举办, 本次会议拟邀请来自 G7 国家的逾百位大学校长, 由他们共商世界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届时, 这些校长及其他高校领导们将就五个关键问题展开探讨, 包括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社会不平等与两极分化、技术变革、社区参与和影响以及大学在全球发挥的关键作用。

U7 联盟是一个由全球各大学校长组成的国际联盟, 旨在协调和促进大学作为全球参与者的作用, 致力于采取多边行动来解决全球问题。U7+全球峰会则是 U7 联盟的年度会议, 于 2019 年在法国巴黎政治学院首次举行。本届峰会将由美国西北大学主办, 乔治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协办。

西北大学校长夏皮罗先生(Morton Schapiro)表示: “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主办此次会议, 为推动大学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领导作用做出贡献。”他还指出, 当今大学应当联合起来, 形成跨学科、跨地域的合作, 以应对全球挑战。此外, 西北大学还将公布一项全球战略计划, 希望发展更深层次的战略伙伴关系, 并扩大对全球社会公益的承诺, 以此履行其作为 U7 联盟一员的使命。

(翻译 / 蔡心兰 校对 / 郭鑫)

[来源: 英国《国际教育专才新闻》, 2020年01月31日](#)

美国：国会成立新机构以应对外国对美国研究的影响

据悉, 美国国会将批准一项重要的法案——《国防授权法》(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NDAA), 同时设立两个新的高级组织机构, 旨在防止外国政府不合理地利用美国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个机构设在白宫, 负责协调十几个政府机构的行动, 保护联邦资助的研究项目免受网络攻击、盗窃和其他来自外国的威胁。另一个是由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研究院(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NASEM)组织的国家科学、技术和安全圆桌会议, 该组织将把学术界、政府和工业界的官员聚集在一起, 就如何在破坏国际合作的前提下保障国家安全向政府提供建议。法案还要求国家情报局局长提供一份年度报告, 汇总美国大学正在进行的“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敏感研究”, 以及外国实体可能感兴趣的研究。美国政府越来越担心外国实体(特别是中国政府及其附属机构)一直在有计划地收购美国资助的研究所产生的知识产权, NDAA 条款的出台正是为了解决这一担忧。

(翻译 / 李天田 校对 / 高磊)

[来源: 美国《科学》, 2019年12月10日](#)

欧洲：英国与欧盟承诺在脱欧后仍保持大学间的合作

2020年1月31日, 英国正式脱欧。为了减少英国脱欧对高等教育学术流动和学术研究的负面影

响, 大学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在英国正式脱欧的同一天, 英国大学协会发布了一系列声明和公告, 重申英国大学继续与欧盟大学合作的决心, 其中一份声明承诺英国大学将与 36 个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保持伙伴关系。英国在 2020 年仍然是“欧洲地平线”(Horizon Europe)计划以及“伊拉斯谟+”(Erasmus+)计划的正式成员国之一, 但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 这两项计划将开始新一轮的项目。因此, 英国大学协会呼吁政府与欧盟委员会进行谈判, 优先对英国继续参与这两项计划进行磋商, 探讨如英国无法继续参与两项计划的替代方案, 并希望英国政府与欧盟尽快达成一致意见。

1 月 28 日, 威康信托基金会(the Wellcome Trust)和布鲁格尔(Brugel)发布了报告《英国脱欧后的研究与创新协议》。该报告称, 尽管英国与欧盟在科研创新方面具有共同目标, 但是双方的谈判仍需要克服许多困难。欧洲大学协会(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认为英国脱欧对于英欧双方的大学都是有利的, 并且在报告中提及英国继续参与欧洲高等教育发展的可能性非常大。

(翻译 / 黄优 校对 / 薛慧林)

[来源: 英国《大学世界新闻》, 2020年02月01日](#)

瑞典: 首个有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研究生学位项目大受欢迎

瑞典隆德大学(Lund University)“2030 年议程博士学位项目”一经启动即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这是瑞典首个针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开设的项目, 隆德大学的所有教师都参与其中, 国际学生也对此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2020 年, 约有来自 106 个国家的 1,183 名学生角逐该项目仅有的 12 个博士生名额。隆德大学的“2030 年议程博士项目”由该校可持续发展论坛和环境与气候研究中心共同管理。该项目具有几个重要作用: 明确挑战与目标, 提供新型解决方案, 促进不同的社会利益相关群体之间进行对话和相互学习, 以及批判性地分析目标。在该项目中, 所有博士生都将有自己的研究计划, 同时还要学习以全球问题为基础而开发的跨学科研究课程。此外, 隆德大学研究生院也会举办相关的活动, 采取研讨会、游学旅行以及与社会企业合作等形式, 推动学生对联合国 2030 年议程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翻译 / 刘亚楠 校对 / 蒋雅静)

[来源: 英国《大学世界新闻》, 2020年01月25日](#)

爱尔兰: 爱尔兰高校获得六项欧洲研究资助

2019 年 12 月 10 日, 欧洲研究委员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宣布了其价值约 6 亿欧元的研究基金的资助名单, 爱尔兰高校在 300 多个受资助项目中占据 6 个席位。其中, 都柏林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获得三项, 高威大学(NUI Galway)获得两项, 梅努斯大学(Maynooth University)获得一项。在上一轮的资助当中, 爱尔兰只有一位获得者。从国家来看, 本次获得资助项目最多的国家分别是德国(52 个)、英国(50 个)、法国(43 个)和荷兰(32 个), 爱尔兰排名第 14。受资助的研究项目涵盖自然科学、工程、生命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本次欧洲研究委员会共收到 2,453

份研究计划, 其中约 12%得到了资助, 31%的资助授予女性申请者。新一轮的拨款将为受资助的研究团队创造大约 2,000 个工作岗位, 支持博士后研究员、博士生和研究组其他成员。

(翻译 / 王泉 校对 / 杨馨缘)

[来源: 爱尔兰《爱尔兰时报》, 2019年12月10日](#)

非洲: 女性在 STEM 领域的领导力——政策需求

尽管大多数非洲国家都已经出台了与性别均衡相关的政策, 但这些政策未能妥善解决女性参与科学、技术和创新的问题。2019年12月2日至6日在加纳开普敦大学举行的非洲女性大学校长论坛研讨会上, 佛罗伦斯·纳卡依瓦(Florence Nakayiwa)博士指出, “在我们研究的四个国家——乌干达、莫桑比克、马里和苏丹中, 只有莫桑比克实施了以科学、技术和创新为重点的性别均衡相关政策。” 据了解, 莫桑比克政府已经起草了一项促进高等教育中性别平等的新战略, 预计明年获得批准。同时, 该国政府还采取了其他措施来提升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的性别包容性, 例如为科学领域的女性学生提供奖学金等。

肯尼亚政府积极执行相应政策以确保任何性别在公共机构中所担任的职位都不超过三分之二, 从而督促大学能够主动招募符合领导职位要求的女性。该政策还帮助提高了各大学课程项目的女性学生入学率。为女性提供管理方面的软技能培训也增加了女性在提升自身能力的基础上参与高级管理决策的可能。

加纳非洲农业研究论坛(Forum for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 Africa FARA)研究主任艾琳·安诺·弗朗蓬(Irene Annor Frempong)博士称, 非洲地区 STEM 领域的学生中仅有 35%是女性, 长期存在的性别偏见阻碍女性进入该领域, 为此, 应采取有效行动增强女性在 STEM 领域的参与性, 确保有适当的制度和政策来激励女性在其教育生涯中继续从事科学工作, 如加强女导师与女性学生的关系、让经验丰富的女性领导者充当榜样、帮助女性学生建立自信和自尊等。

(翻译 / 吴辰钦 校对 / 武岳)

[来源: 英国《大学世界新闻》, 2019年12月12日](#)

朝鲜: 国际教育日渐开放

朝鲜的国际教育日益开放, 包括接收国际学生。对于为数不多的去过朝鲜的学生来说, 这是一次特别的经历。据在金日成大学(Kim Il-Sung University)交换的中国学生描述, 他们和朝鲜学生的交流很少, 也没有社团或俱乐部可加入。交换生还受到具有“良好家庭背景”的同伴的监督, 同伴帮助交换生学习和生活, 但也有监视的目的。曾在金日成大学学习的澳大利亚学生阿莱克·西格利(Alek Sigley)曾为《卫报》等报纸写过关于“成为朝鲜唯一的澳大利亚人”的文章, 他后来被拘留并驱逐出境, 成为与当地政府发生冲突的诸多外国人中的一员。

对于喜欢冒险的人来说, 短期学习成为了一种新的选择。留学代理机构“青年先锋之旅”(Young

Pioneers Tours)的常务董事特洛伊·科林斯(Troy Collings)称, 2019年有16人参加了游学, 不过, 游学仍然是一种新产品, 仍需要时间与朝鲜机构建立更深层次的信任和合作。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Un)认为朝鲜远远落后于全球教育发展趋势, 并呼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学术合作。特洛伊·科林斯说:“如果不与之互动, 就无法改变什么。70年来的制裁和强制孤立都没有取得明显的结果, 我认为应该鼓励与朝鲜的国际联系。”

(翻译 / 肖港 校对 / 张兴)

[来源: 英国《国际教育专才新闻》, 2020年01月03日](#)

专题一: 专业博士培养 (综述/新闻/学术前沿/书籍推荐)

《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综述》

过去20年中, 高等教育领域的专业博士学位课程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文献数量见增。本研究以193篇学术论文为依据, 使用简单的计票方法对其进行分类, 将专业博士学位类型、研究地区、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发表年份等纳入考虑因素, 系统地勾勒了现阶段专业博士学位的学术知识。

以学生数目为参照标准, 研究确定了专业博士学位的几个大类: 教育学博士学位(EdD)、工商管理学博士学位(DBA)、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DClinPsy)等。在地理空间分布上, 目前只有少数国家授予专业博士学位, 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研究类别方面, 现有文献可根据主题划分成四类: 专业博士学位对院校的价值、课程内容、研究培训内容和学生体验。关于研究方法, 多数论文以案例研究为基础, 同时使用不同方法或多种技术来收集数据。出版年份方面, 高达89.2%的论文(不包括出版未满一年的论文)是在斯科特等人(2004)的开创性工作之后发表的, 出版物数量的增长反映了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专业博士学位课程的建立和增长。值得注意的是, 许多研究是以教育学博士学位课程为基础开展的。

本综述强调了在该领域开展学术工作的必要性, 即冲破案例研究的视阈, 对专业博士发展进行整体把握。同时, 研究点明了未来研究的重要领域。首先, 除教育学博士学位在课程内容和学生体验两个重要方面成果显著外, 有关其他类型专业博士及其他研究类别的文献有限。其次, 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现有研究可以为其他国家的研究提供参考。最后, 大多数文献都集中在教育学博士学位的课程教学方面, 对论文阶段和导师的角色了解甚少。

(翻译 / 刘晓雯 校对 / 李秋实)

[来源: London Review of Education \(伦敦教育评论\), 2018年03月刊](#)

Hawkes, D., & Yerrabati, S. (2018).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esearch on professional doctorates. *London Review of Education*, 16(1), 10-27.

美国: 普渡大学技术学院开设首个远程博士学位项目

2019年秋季, 普渡大学技术学院(Purdue Polytechnic Institute)正式启动了筹备六年的技术博士(Doctor of Technology)远程教育项目。这是一流研究型大学首次提供完全线上的技术博士项目, 旨在为从业人士提供更高的学历教育。该项目既涉及以实用为导向的基础研究, 也包含纯应用研究及开发。此外, 学生还有机会参与以促进工作生活平衡为主题的世界一流项目, 与同行专业人士和教师进行交流学习。目前, 《科技领导力与创新》是此项目的首个课程, 未来将会继续增加其他特色课程。此外, 普渡大学技术学院还提供其他在线研究生项目, 包括航空安全管理、行政管理、信息技术业务分析、信息技术管理等专业。

(翻译/徐一情 校对/蔡心兰)

[来源: 普渡大学技术学院官网, 2019年12月16日](#)

加拿大: 卡尔加里大学设立“设计博士”学位

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建筑、规划和景观学院(School of Architecture, Planning and Landscape)即将启动“设计博士”(Doctor of Design)学位项目。不同于培养学术工作者的博士学位, 此学位是为那些处于职业发展中期专业人士设立的。

“设计博士”项目为期三年, 每年计划招收8名学员, 且申请者需已经离开教育系统5-10年。“设计博士”项目仿照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oyal Melbour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一个类似项目, 该学位项目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实施, 并在与亚洲和澳大利亚的合作中都取得了成功。卡尔加里大学景观学院院长约翰·布朗(John Brown)就曾通过该项目获得学位, 并首次将其引入加拿大。

约翰·布朗认为, 人们在实践中总能观察到问题或解决方案, 但在全职工作中却很难花时间和精力来进行观察, 而此学位项目为职业中期人士提供机会——他们将继续以专业身份工作, 并在春季和秋季的长周末参加卡尔加里大学的研讨会, 以帮助其发现和探索自己职业中的问题。他还表示, 大多数申请者已从事专业工作超过10年, 甚至可能是合作伙伴或负责人, 他们有经验、有能力且有准备, 可以将实践研究结果自然而然地运用到工作中, 从而获得直接、及时的反馈。卡尔加里大学官网显示, 2020年秋季项目申请已开放, 并将于2020年2月1日截止, 拟录取5人。重要专业经验可视为与硕士学位同等学力。

(翻译/杨媛 校对/李宜可)

[来源: 加拿大《商务日报》, 2020年01月14日](#)

《专业博士学位课程影响与成效的测量》

通过对某专业博士学位国际会议研讨会中30名与会学者进行质性调查, 本研究收集了他们对以下三个问题的看法: 您如何衡量专业博士课程的影响和成效? 您知道目前存在哪些可用的测量工具、框架、基准或指南? 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测量专业博士课程的影响和成效? 针对问题一, 与会学者认为

目前大家对“影响”和“成效”两个术语的概念界定和理解并没有达成一致;与“成效”相比,“影响”得到了更多的重视;衡量学生完成博士学业后的影响和成效存在困难。同时,学者们也认识到学生在不同平台上有针对性地分享和宣传专业博士学位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作用。针对问题二和三,学者指出,为全面了解专业博士的影响和成效,尽快区分和理解“影响”和“成效”这两个术语至关重要,同时应认识到外部评估的重要意义,并开发一种由全体利益相关者参与的专业博士学位课程评估方法。此外,学者们还强调,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个性特征,热心、有毅力,这样才能坚持在毕业后继续分享和传播专业博士学位对其人生经历所产生的影响。

本研究的原创性和意义在于对专业博士课程影响和成效的测量方法进行了梳理,并设计了一套在课程完成前、完成期间和完成后不同阶段跟踪和评价课程的方法。新设计的由全体利益相关者参与的专业博士学位课程评估方法结合了个人、组织、专业和雇主(Personal, Organisational, Professional and Employer, POPE)等不同视角,并强调了全面纵向评估的重要性。

(翻译/黄亚鑫 校对/陈庆)

[来源: *Studies in Continuing Education* \(继续教育研究\), 2019年01月刊](#)

McSherry, R., Bettany-Saltikov, J., Cummings, E., Walker, K., Ford, K., & Walsh, K. (2019). Are you measuring the impacts and outcomes of your professional doctorate programme? *Studies in Continuing Education*, 41(2), 207-225.

《专业博士学位的质量保证:从导师的角度挑战传统规范》

本文从导师的角度批判性地调研了专业博士学位(Professional Doctorates, PDs)的质量议题,了解质量保证规定如何与导师期望相契合。本研究采用解释性的研究方法,使用半结构式访谈和半结构式在线问卷,收集了来自英国不同大学的25名导师的数据,并使用交互式、自下而上的数据分析方法和解释策略进行数据解读。通过对导师观点的分析,提炼了四个方面的主题:导师的特点、院校提供的质量保障办法、专业博士学位质量保障过程中的挑战以及导师对加强专业博士学位质量保障的建议。

研究发现,质量保证条款并未充分体现专业博士学位的独特性,比如专业博士学位(相较于哲学博士)在培养理念和侧重点上不够明确、不同专业的导师理念不同等。本文认为,针对专业博士学位的人才培养必须制定可靠的质量保证规定,必须确保对专业博士学位的基本理念和侧重点有统一的界定。此外,必须确保质量保障条款不仅涵盖高等教育的学术严谨性,还考虑到实践成果的价值和行业影响。本文还着重介绍了导师对如何加强质量保证提出的一系列有益建议。

(翻译/薛慧林 校对/金雨琦)

[来源: *Quality Assurance in Education* \(教育质量保障\), 2019年07月刊](#)

Abukari, A., & David, S. (2019). Quality assuring the professional doctorate: Challenging traditional precepts through the supervisors'/advisers' lens. *Quality Assurance in Education*, 27(3), 304-3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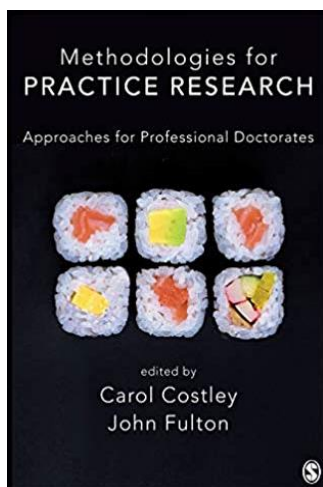
《学生对香港教育博士及教育哲学博士的认识》

本研究旨在探讨攻读香港教育博士学位 (EdD) 以及教育学哲学博士学位(PhD in Education)学生的学习体验。通过选取香港一所大型公立研究型大学开展访谈, 该研究收集了 10 份半结构化访谈的质性数据。通过对访谈数据进行分析, 得到四个主题。在教育博士和教育学哲学博士学位之间的关系方面, 学生们认为尽管教育博士和教育学哲学博士有着不同的培养目标, 但仍属于同一学位层级。在教育博士项目的定位方面, 学生们一方面认为教育博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之间的区别仅存在于学生背景和录取标准方面, 在课程目标和内容方面没有区别, 但另一方面学生们又认为教育博士的学习所得比哲学博士要浅, 学术能力弱于哲学博士。在教育博士的学术价值方面, 学生们认为教育博士获得的知识和技能是缺乏学术价值的。在与导师的关系方面, 学生们认为教育博士与导师的关系不如教育学哲学博士与导师的关系亲密。

(翻译/蒋雅静 校对/刘亚楠)

[来源: Tertiar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高等教育和管理\), 2018年12月刊](#)

Jung, J. (2018). Students' perception of EdD and PhD programmes in Hong Kong. *Tertiar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24(4), 284-297.



《专业博士的实践研究方法》

本书以实际应用为导向, 强调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 并提供了设计和实施高质量研究项目的方法策略, 有助于研究人员加深对实践研究重要性的认识。本书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内容: 1.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 2.表达复杂思想的策略; 3.深入了解常见的影响驱动(impact-driven)的研究方法, 如行为研究、案例研究和混合研究; 4.日常生活中开展系统研究项目的途径; 5.充分检验与应用新知识。此外, 本书还从多个维度详细介绍了专业博士的特点和独特优势, 并与传统的博士学位进行了区分。本书为专业博士研究提供精简建议, 是从事实型项目研究者的必备工具。

(翻译/王倩 校对/丛琳)

作者: Carol Costley, John Fulton

出版日期: 2018年12月

出版商: SAGE Publications Ltd

[来源: https://uk.sagepub.com/en-gb/asi/methodologies-for-practice-research/book253892#description](https://uk.sagepub.com/en-gb/asi/methodologies-for-practice-research/book253892#description)

专题二：校企合作（报告/评论/新闻/学术前沿/书籍推荐）

《校企合作：新的证据和政策选择》

知识资本对提高竞争力和应对社会经济挑战的重要性日益增强，这使那些拥有强大公共研究能力和能够有效利用研究成果进行创新的国家受益匪浅。因此，了解公共研究投资如何对创新产生最大化的影响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报告为这些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并探讨了经合组织(OECD)国家为支持科学-产业知识转移而采取的政策工具。

科学-产业知识转移对创新的影响

评估公共研究对创新的影响是一项复杂的任务，而知识转移渠道的多样性也对评估方法提出了挑战，需要考虑影响知识交换的各种因素。该报告为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知识交流渠道提供了新的证据：高等教育机构、公共研究机构和产业界共同提交的专利申请数的增长，反映了高等教育和公共研究机构越来越多地与产业界进行知识共创；学生和研究人员初创企业的数字表明，学术衍生活动是研究在创新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另一种方式；社会科学领域毕业生的流动是创新的另一个关键因素，特别是对于某些学科和工业部门而言。

支持知识转移的政策工具

OECD 国家实施了一系列金融、监管和软工具来促进科学与产业之间的知识交流。金融工具包括研发和创新补助金、以合作为重点的税收激励措施以及为招募博士或博士后提供的财政支持；监管工具包括知识产权制度、关于研究人员创造附带利益的条例、研究人员的休假和流动计划；软工具包括提高认识、建立网络活动以及制定标准和行为准则。此外，还有一些新兴的知识转移政策手段，包括支持科学与产业知识的共同创造、建立中介组织以帮助匹配新技术的供求关系、利用数字平台实现新型开放式的数字创新形式、开发新计划以支持衍生产品等。

政策组合和治理机制的影响

当政府为知识共创、数字创新和学术衍生产品添加新的政策工具时，这些工具的影响不仅取决于自身的特点，还取决于其他现行政策。不同的政策工具在同时执行时可能互相加强和互补，但也可能产生矛盾和过度的复杂性。政策组合的有效性还取决于公共研究的治理，即管理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研究资助的制度安排。OECD 项目的实践证据为促进校企合作提供了有效的措施，包括提高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自主权、增加商业部门和社会大众在大学委员会和研究与创新委员会中的参与度、依赖基于绩效的筹资机制来激励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参与产业合作等。

本报告对知识转移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制定符合产业和研究需求的知识转移政策：(1) 知识转移没有“一刀切”的政策方法，各国在

进行政策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其经济结构和公共研究领域的优势；(2) 政策应支持公共研究机构开展与其研究优势相一致的知识转移活动；(3) 政策应利用数字技术提供的知识转让机会, 提高研究基地的国际竞争力；(4) 政策应支持战略性的、面向长期的共创形式。

二是要加强知识交流政策组合：(1) 各国应该在知识交换的政策组合中增强协同作用, 减少复杂性；(2) 决策者在设计和评估知识交换政策时应考虑政策工具之间的相互作用；(3) 赋予高等教育机构和公共研究机构在组织知识交流方面更大的自主权；(4) 修订新的监管框架, 使产业和社会更多参与高等教育机构和公共研究机构的理事会, 促进决策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商；(5) 利用新的数据来源和方法评估知识转移。

(翻译 / 赵丽文 校对 / 刘晓雯)

[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官网, 2019年04月](#)

加拿大的校企合作项目设计存在问题吗？

加拿大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资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 这一事实长期困扰着政策制定者。如何培育创新型企业, 进而成为全球领导者仍是其政策议程的重点。尽管对校企合作的支持越来越多, 但加拿大企业研发经费支出滞后的情况仍没有明显改变。加拿大公司在研发方面长期投资不足的模式是很明显的, 这也引起人们对联邦政府正在进行的校企合作项目投资产生了质疑：它们是否解决了它们要解决的问题？

研究表明, 校企合作项目存在目标与实际脱节的问题：1. 合作项目对商业产出的重视与研究资助的学术评估标准之间脱节；2. 经济中创新应用的总体目标和当前大型企业大规模参与传统行业的现状之间脱节；3. 校企合作项目能够带来附加价值和互惠互利的期望与当前学术研究人员依靠校企合作来弥补研究资金短缺的现状之间脱节。总之, 政府需要在项目评审和设计中更好地理解企业和大学研究人员, 且项目必须在工业合作伙伴的经营战略背景下进行评估。

大量研究表明, 校企合作可以为合作伙伴带来互惠互利, 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然而, 刺激这些互动的政策工具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它们可能无法实现其目标, 甚至造成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加拿大机构亟需重新审视其校企合作项目。联邦政府已经表达了简化和巩固商业支持的意图, 自然科学基金与工程研究委员会也在重新审视其合作项目, 并提出了一个与研究人员和其他用户协商的新框架。政府应确保合适的组织参与到合作项目中, 并产生长期效应, 真正解决它们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翻译 / 丛琳 校对 / 李婉婷)

[来源：加拿大《政策选择杂志》, 2019年01月17日](#)

全球：校企合作是抗击冠状病毒的关键所在

2020年1月30日,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2019-nCoV)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去几年研究冠状病毒的一位前沿科学家强调, 与产业界合作将是快速开发应对此次疫情工具的关键。目前, 学术界和制药公司正竞相研发疫苗, 以期尽快投入临床试验。

据爱思唯尔旗下的斯高帕斯(Scopus)数据库显示, 从2014年到2018年, 全球有2,700篇已发表论文的标题、摘要或关键字中含有“冠状病毒”字样, 这其中大部分的研究与2012年发现的由冠状病毒引起的中东呼吸综合症(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有关。

近年来在冠状病毒领域发表了数十篇论文的乌特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病毒学副教授贝伦德·扬·博世(Berend-Jan Bosch)表示, 其团队的研究不但可能有助于疫苗的研发, 而且有助于在没有表现出症状的阶段确定感染病毒的总人数。该团队曾与伊拉斯谟(Erasmus)合作, 开发了确定骆驼种群中中东呼吸综合症患病率的测试方法, 进而对该病在人群中的患病率调查发挥了重要作用。针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 博世表示已经找到了可以帮助开发新型冠状病毒诊断测试的合作伙伴, 校企合作在抗击疫情的战争中至关重要。他说:“如果需要尽快进入临床阶段, 就需要公私合作联合开发, 仅凭学术研究无法实现。”博世还呼吁要对冠状病毒开展持续研究, 尤其是那些动物传染给人类的病毒。

(翻译/鞠彤洁 校对/李欢)

[来源: 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 2020年01月31日](#)

《重构社会科学博士教育中的组织合作》

在社会科学领域, 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涉及与校外组织的合作。本文尝试探讨英国社会科学领域博士生如何解决合作过程中的问题, 从而丰富这一研究主题的相关国际文献。我们使用叙事性访谈方法和行政性数据开展了一系列案例研究, 将这些研究与理论化的学科知识和实践并列在一起, 以显示这种形式的合作既有高要求和不可预测性, 同时又能激发新理解或洞见的产生。该研究认为, 博士生对于社会科学知识的体验形式是不同的, 很多时候甚至是矛盾的, 因此要将这种体验概念化并不容易, 不过, 布洛维(Burawoy)关于公共社会学、批判社会学、专业社会学以及政策社会学之间对立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模型能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启发式的作用。分析认为, 工具性以及批判性的社会知识都能从组织合作关系中获得, 我们也呼吁进一步关注博士生组织合作中的“生成悖论”(generative paradoxes)与“反射纠葛”(reflective entanglements)问题, 期望新的博士教育方法能够将这些合作经验转化为帮助博士生完成蜕变的工具, 并将其视为社会研究的一项关键技能。

(翻译/黄宗坤 校对/高磊)

[来源: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 2019年08月刊](#)

Mills, D., & James, D. (2019). Reconceptualising organisational collaborations in social science doctoral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3), 1-19.

《新兴国家工科毕业生是否准备好从事研发工作?以教学为中心的产学协作战略》

大多数新兴国家的工程与技术专业学生的教育质量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 因此需要公司在员工在职培训方面大量投资, 以保证毕业生为研究与开发岗位做好准备。本研究选择印度的10家公司(包括跨国公司和本地企业)为研究对象, 对65次访谈数据与大量二手数据进行分析, 试图揭示这些公司在尽可能减少在职培训投资的背景下, 如何与大学形成以教学为中心的协作关系以培训毕业生具备研发运营所需的必备技能。本研究还探讨了除传统的毕业生招聘以及培训模式——在职培训外, 以教学为中心的产学协作作为人才招募策略的又一选择的可行性。本文通过总结以教学为中心的产学协作的不同模式, 旨在加强毕业生的理论知识并提高企业所需的特定实践以及应用技能, 同时揭示开展产学协作的驱动力以及挑战。此外, 本研究还阐述了产业和大学之间进行教学协作活动的作用, 这在以往的文献中是被忽视的。

(翻译/武岳 校对/王莹)

[来源: Research Policy \(研究政策杂志\), 2019年11月刊](#)

Borah, D., Malik, K., & Massini, S. (2019). Are engineering graduates ready for R&D jobs in emerging countries? Teaching-focused industry-academia collaboration strategies. *Research Policy*, 48(9), 1-15.

《资深专家如何基于高等教育的工作实践发展创业技能: 文献综述》

该研究探讨了校企合作如何促进大学里的资深专家发展创业技能, 以及他们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研究者结合不同的方法对文献进行综述, 回顾了前人对基于工作实践的研究生教育如何促进创业技能的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加深入的阐释。研究者认为创业技能的发展是通过转化并整合理论层面、实践层面及自我调节层面的知识而形成的, 这进一步验证了先前的研究。研究结果还表明:(1)学习者应被支持和允许自我调节学习过程, 发挥自主性和自我管理的能力;(2)要鼓励学习者解决具有不确定性的非常规问题;(3)要支持学习者进行个人转型和身份转化;(4)专业技能的发展应被视为一个持续的、基于具体情境的、个性化的过程。

(翻译/郭鑫 校对/杨馨缘)

[来源: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 2019年05月刊](#)

Wallin, A., Nokelainen, P., & Mikkonen, S. (2019). How experienced professionals develop their expertise in work-based higher education: a literature review. *Higher Education*, 77(2), 359-378.

《战略性校企合作伙伴关系：创新型企业的成功要素》



本书展现了世界领先企业的管理者对大学合作的独到见解。事实表明, 产学合作对创新至关重要, 但也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其需要企业管理者围绕五个成功因素进行谨慎且明智的管理, 促使合作双方互利共赢。目前从大学视角对产学合作关系的研究较为丰富, 但鲜有研究从企业角度进行理解。因此, 本书在不忽视大学视角的前提下, 收集了宝马(BMW)、杜邦(DuPont)、法罗里奥(Ferrovial)等世界领先企业管理者的见解, 对校企之间合作存在的主要挑战以及世界知名公司的应对措施进行介绍, 同时描述了企业与大学合作的成功因素, 如选择正确的合作领域、合作伙伴和合作模式并采用正确的组织支持方法和评估标准。本书可以作为校企合作的重要指南, 为合作关系中的所有合作伙伴提供相关参考。

(翻译 / 李晶 校对 / 魏青鸾)

作者: Lars Frølund, Max F. Riedel

出版日期: 2018年6月8日

出版商: Academic Press

来源: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book/9780128109892/strategic-industry-university-partnerships#book-description>

专题三：高校如何应对环境危机（政策文件/评论/新闻/学术前沿/书籍推荐）

《哈佛大学 2015-2020 财政年度可持续发展计划》

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是全球性问题, 需要组织、政府及企业做出大胆和明确的反应。哈佛大学的校园网络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生态系统。从制度角度来看, 哈佛大学的目标是将大学转变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区, 为社会、经济、环境带来积极效益。哈佛大学致力于将可持续发展的最佳实践措施进行制度化, 并通过将校园作为创新试点为社会提供可被广泛引用的解决方案, 将研究和教学转化成实践。

基于前期的可持续发展框架, 哈佛大学可持续发展办公室(The Harvard Office for Sustainability)领导制定了哈佛大学可持续发展计划, 该计划于 2015 财年至 2020 财年实施, 覆盖整个哈佛大学北美校区。该计划围绕五个核心主题, 分别是排放与能源、校园运作、自然与生态系统、健康与福祉、文化与学习, 每个主题在其目标、标准及承诺方面各有侧重。排放与能源主题包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节约能源以及发展可再生能源; 校园运作主题包括新建筑、施工、运输、气候准备与校园适应力、采购; 自然与

生态系统主题包括景观布局、校园设计以及环境保护和教育;健康与福祉主题包括个人福祉和食物;文化与学习主题包括研究和教学、管理、外部合作、通信和社区行动。总体而言,该计划具有灵活性,为整个大学奠定了基线,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开展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探索和创新。

(翻译/魏青鸾 校对/鞠彤洁)

[来源:哈佛大学官网](#)

大学能为应对气候变化做更多的工作吗?

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大学担负着极其重要的特殊使命:现代化大学不仅可以提供创新的智力资源、推动社会各界开展合作,还能通过相关研究、出版物和以身作则的各种应对措施对公众产生积极影响。不过,大学是否已经做到尽职尽责、全力以赴尚需探讨。当一些大学已经挺身而出,在生产和使用可再生能源、减缓物种损失速度上走在前列时,更多的高校行动迟缓。

新南威尔士大学威廉·希德尔(William Syddall)提出,大学不仅要致力于把学生培养成未来领袖,还应树立将其培育成可持续发展的倡导者的教育理念。具体行动方面,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杰米·阿贡巴(Jamie Agombar)倡导绿色校园的理念:“建设并利用高校绿地储备,减少碳排放、减少使用不可再生能源、生产可再生能源,同时保证所有专业的学生都能够理解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危机。”

面对气候变化,不作为或少作为亦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美英澳等国均曾表现如此态度。以英国为例,在154所被评为可持续发展的大学中,仅有三分之一的大学有望在2020年之前实现全方位减排43%的目标。调查结果显示,许多英国高校在可持续发展的教与学方面有所改善,但政治力量或成为阻碍。更有甚者曾于2019年计划取消英国大学的碳排放记录,使大学完成碳减排目标的结果不了了之。由此可见,让大学这一世界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对气候变化树立足够的意识并做到身体力行、有所作为,仍然是道阻且长。

(翻译/李婉婷 校对/李秋实)

[来源:英国《国际学术新闻》,2019年09月17日](#)

英国:罗素集团联手应对气候危机

由英国最顶尖的24所大学组成的罗素集团于2019年12月9日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全球环境和生态系统挑战十分紧迫”。罗素集团承诺通过研究、教学和更加可持续的实践来应对气候变化。一方面,他们计划减少碳排放,提高建筑的能源效率。另一方面,罗素集团各大学正在通过新的环境可持续性网络相互学习,努力减少浪费,增加回收利用,在校园内推广素食选择,并将可持续性融入采购实践,以有效地利用其综合支出能力。罗素集团政策经理乔安娜·伯顿(Joanna Burton)表示,24所成员大学与学生合作,通过学生主导的社团、活动项目和志愿服务等方式确保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了解可持续性。此外,罗素集团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在一系列减轻环境变化、减少全球碳足迹问题上处于领先地位,包括粮食安全、防洪、清洁能源、材料科学和空气污染方面。2018年,加州大学校长珍妮特·纳波利塔诺(Janet Napolitano)和纽约州立大学校长克里斯蒂娜·约翰逊(Kristina Johnson)在《华盛顿邮报》

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了大学在减缓气候变化中的带头作用。虽然大学可能不是解决气候危机的灵丹妙药, 但高等教育部门的确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

(翻译 / 李宜可 校对 / 黄亚鑫)

[来源: 英国《国际学术新闻》, 2019年12月12日](#)

英国: 约克郡科学家将领导气候变化数据新研究

英国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和英国航天局共同设立了环境科学卫星数据中心(The Centre for Satellite Data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SENSE)以监测气候变化。卫星图像来自哥白尼哨兵-3A卫星, 横跨欧洲大陆, 收集到的数据有助于预测未来天气、制定防洪计划以及监测气候变化等, 政府也对此表示支持。英国科学部长克里斯·斯基德莫尔(Chris Skidmore)称英国计划于2050年消除本国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利兹大学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先行者, 正在针对这一关键问题进行开创性研究。环境科学卫星数据中心是由5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4,500余万元)资金支持的新虚拟数据中心, 汇集了利兹大学、行业领袖和一批新进人才, 他们的宝贵见解可能影响未来的政府政策, 同时也将确保英国在地球观测方面仍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届时还有包括空客和联合利华在内的18家企业将资助、协助设计和监督该项目, 这也将有力推动大学和行业的合作。

(翻译 / 金雨琦 校对 / 李天田)

[来源: 英国《约克郡邮报》, 2019年12月30日](#)

《I3E模型: 将可持续发展教育纳入高等教育机构》

本研究考察了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将可持续发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纳入大学课程的组织变革过程, 并由此提出了一个基于实证研究的I3E模型。研究者采用行动研究方法, 即在一个跨学科的学术小组中担任可持续发展教育课程开发的协助者, 并以此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同时, 研究者还在实践团队中扮演了关键伙伴的角色, 该团队致力于将可持续概念融入学生的学习体验。I3E模型明确了四个有助于大学将可持续发展教育纳入本科课程的总体要素, 分别为(1)在大学社区中共享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相关信息(Inform); (2)让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变革过程(Engage); (3)使个人和团体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变革(Empower); (4)将可持续发展教育纳入到现有的大学架构中(Embed)。

(翻译 / 张兴 校对 / 郭鑫)

[来源: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环境教育研究杂志\), 2016年07月刊](#)

Cebrián, G. (2018). The I3E model for embedding 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with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24(2), 153–171

《国际研究概念框架下的高校气候变化教育》

如果要应对全球共同面临的科学、社会、环境和政治挑战, 高校在气候变化教育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未来领导人必须在获得足够信息的基础上做出决策, 公众也需要将缓解气候变化的方法融入工作和生活。因此, 有必要了解全球高校当前所采取的气候变化教育策略, 并探索和分析如何更好地应对这一挑战。本研究分析了不同国家高校气候变化教育的开展情况, 并提出了一个概念框架, 用以探讨高校将气候变化教育纳入其课程体系中的不同模式。来自45个国家的212名大学工作人员的数据资料表明, 气候变化教育在国家层面没有明确的模式, 即使在高校内部, 方法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反映出不同国家和社会对高校气候变化教育的理解各不相同, 同时也体现了高校独立性和自主性的重要性(高校应自主选择适合本校的发展方式)。本文通过大量实例展示了气候变化教育融入高等教育体系的多种方法, 其中一些方法对全球高校均有借鉴意义。

(翻译 / 李秋实 校对 / 林婕)

来源: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清洁生产杂志\), 2019年07月刊](#)

Molthan-Hill, P., Worsfold, N., Nagy, G. J., Leal Filho, W., & Mifsud, M. (2019). Climate change education for universitie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rom an international study.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26, 1092-1101.

《大学在应对和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的举措》



本书聚焦于高等教育机构如何应对和减缓气候变化并促进这一快速增长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本书包括了实证研究的结果与相关理念, 这些理念多与正在进行的以及未来将要开展的研究计划相关。本书的贡献在于: 展示了全球各大学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和项目; 记录并推广在执行研究项目中所产生的想法和经验, 特别是成功的倡议和最适宜的做法; 介绍了相关的研究方法和科研项目, 从而更深入地了解气候变化对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影响。本书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开展气候变化教育与研究的经验, 另一部分是

气候变化本身与相关项目带来的启示。每个部分分别侧重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缓解与适应, 同时两个部分之间存在许多相互交叉的内容。本书介绍了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学中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教育、交流和与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进行的项目, 对于来自环境、人文地理、商业和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资源。

(翻译 / 赵一玮 校对 / 陈庆)

作者: Walter Leal Filho, Rafael Leal-Arcas

出版日期: 2018年07月16日

出版商: Springer

来源: <https://link.springer.xilesou.top/book/10.1007%2F978-3-319-89590-1#about>

读者意见征集

《国外研究生教育动态》自创刊以来受到了多方的关注与关心，您的关注是我们始终努力向前的最大动力。为不断改进刊物质量，如各位有任何建议，比如您比较希望关注的内容或者国家等，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联络：

邮箱：cehd@sjtu.edu.cn

电话：021-3420-5941 转 28

编辑：朱佳斌 郑天一

编辑助理：黄亚鑫

版权声明

本刊登载的所有内容均来源于网络，读者可将本刊内容用于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以及其他非商业性或非营利性用途，但同时应遵守著作权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不得侵犯本刊及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如欲转载，请与本刊联系。

《国外研究生教育动态》

《国外研究生教育动态》每月及时选载世界各地报刊媒体和高等教育组织机构发布的最新信息和观点评论，全面报道国外研究生教育最新动态。本刊致力于帮助我国研究生教育决策和管理者、研究生教育研究者、研究生教师等相关人士，了解国外研究生教育的最新动态、不同观点、重要数据和研究成果，加强中外研究生教育的比较和借鉴，以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工作者在国际视野下更切合实际、更有竞争力和更富创新求是精神地开展工作。

编辑：朱佳斌、郑天一 编辑助理：黄亚鑫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育教学与人才成长研究中心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800号

邮编：200240

邮箱：cehd@sjtu.edu.cn